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戊戌变法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戊戌变法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1898年9月28日，阴霾笼罩下的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囚车押来了6名志士，在监斩官草草宣布了朝廷的死刑判决后，刽子手操起屠刀，向这6名志士的身上砍去，顿时，鲜血染红了他们脚下这片多灾多难的大地，同时这也宣告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变法改良运动的悲壮失败。由于这一一年是中国干支纪年的戊戌年，所以史称这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为“戊戌变法”。现在，就让我们将目光投向近100年前的岁月，踩着历史的履痕，去翻看这凝重而又令人沉思的一页。

一、深重的民族危机

戊戌变法运动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中华民族面临深重危机背景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当时部分进步的资产阶级维新人士。联合统治集团中的开明派所从事的一场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分水岭。从那时开始，古老的中华帝国大门，一次又一次被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用大炮轰开，在腐朽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面对英、法、美、俄、德以及后起的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无力自卫，处处被动挨打，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先后被打败，被迫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的条约，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在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史上，中日甲午战争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这场为时9个月的战争，以清王朝几十万陆军溃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最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结局。它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划时代的影响，即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由商品输出进入以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自此之后，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办工厂，修铁路，开矿产，设银行以及发放政治贷款等，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通过这些手段，列强摧毁中国社会经济的每一个堤岸，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同时也给中国自身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彻底暴露了它的腐朽与虚弱，帝国主义列强看清这个庞大帝国的虚实后，就自然而然萌生了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掀起了争夺势力范围的狂潮。这股狂潮开始于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以索取巨额报酬，经过几年时间的你争我夺，中国的大部分国土都成了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列强的各自势力范围。其中德国强租胶州湾，把山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通过和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一步步形成其独霸东北的局势。英国作为老牌侵略者，自然不甘落后。控制了广大的长江流域地区。法国强租广州湾，将广东、广西和云南等地区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日本除了霸占台湾和澎湖列岛之外，又在瓜分风潮中取得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则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利益均沾为借口，分享其他列强的侵略利益。这样一来，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外国侵略者到处横行无忌，中国面临着由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民族被毁灭的严重危机。

外国侵略者之所以能够在征服、瓜分中国的道路上得寸进尺，为所欲为，这是同清政府腐朽、反动的统治直接相联系的。换句话说，即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是导致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极度专制的封建君主制下，政治上极端黑暗腐朽，整个官僚机器失灵，各级官吏昏聩无能，

从皇帝到各级官吏以至土豪劣绅，都穷奢极欲，贪污成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广大民众在沉重的劳役、地租剥削下，难以维持生计，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这种情况在甲午战争之后进一步趋于恶化。当时的清朝政府，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完全丧失了抵御的勇气，沦为列强手中的驯服工具，它对列强们的无耻索取是有求必应，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了满足列强的掠夺欲望，清政府转而向广大民众敲骨吸髓，大肆搜刮。它大幅度增加地丁税、盐税、厘金等各种苛捐杂税，并强迫民众承担繁重的封建差徭。各地官员则乘机巧立名目，加大搜刮的范围和份额，造成全国民不聊生，一片怨声载道。然而清政府这些措施并没有缓解严重的财政危机，反而极大地激化了早已存在的阶级矛盾，使得封建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外来的无止境侵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使统治秩序濒临崩溃的边缘。它们的合流，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激起了广大民众对外国侵略者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强烈反抗。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虽然被清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但是人民的反抗并没有一天停止。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地会党以“打富济贫”、反洋教相号召，开展了此伏彼起的群众斗争。到90年代，城市贫民和乡村农民的抗捐抗税斗争，遍及全国10多个省份。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更连绵不断地掀起反洋教、反官府斗争的巨浪。其中四川余栋臣的起义，发布檄文，痛斥外国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英勇抗击清军的围剿，影响波及30多个州县，这标志着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正在向更大的规模发展。

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半封建化加深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历史现象相伴随的，是中国内部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进一步解体，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提供了一些客观条件，这主要表现为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扩大。而严重的民族危机，也激起许多中国人的爱国热忱，他们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措施，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要求自办铁路，开采矿山，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清政府方面为了增加税收，解决财政危机，也需要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所以，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决定承认民族资本主义的合法地位，提倡和奖励民间创办工厂，从而结束了洋务派垄断企业的局面。这样就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甲午战争后获得了初步的发展。自1895年至1898年，新建立的商办厂矿企业有51家，资本总额近1200万元，其数量相当于甲午战前20多年创办的商办企业数，而资本总额则高出战前约两倍。当时还出现了一些较有规模的大厂矿，如上海的裕晋纱厂、大纯纱厂、裕通纱厂，无锡的勤业纱厂，杭州的通益公纱厂，苏州的苏纶纱厂，河北的磁州煤矿、井陘煤矿等等。与此相适应，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还形成了少量的民族资产阶级。

然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是非常缓慢的。它无力与帝国主义列强雄厚的资本和廉价的商品相竞争，随时面临着破产和倒闭的命运。而清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层层勒索，各种苛捐杂税纷至沓来，也严重窒息着其发展的生机。同这种情况相一致的是，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还相当单薄，他们基本上是官僚、地主、买办、富商多位一体，不得不依赖、攀附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

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显著特色。

由此可见，由于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由于清政府腐朽统治所导致的严重社会危机，使 19 世纪末的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俗话说，物极必反。社会腐败到了极点，人们必然会提出改变社会现状的强烈要求，这样就形成了戊戌变法的广阔社会背景，为这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产生提供了前提。而 19 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艰难曲折条件下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崛起，则为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同时，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和不成熟，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决定了戊戌变法这场救亡图存运动不可能以革命的形式出现，而只能以改良的面目问世，并最终难以摆脱遭受挫折的历史命运。

二、从万木草堂到公车上书

“风起于青萍之末”。戊戌变法作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发生于 1898 年，但它作为一种变法维新思潮，则由来已久，是长期酝酿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不懈倡导的结果。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就提倡“睁眼看世界”，提出了改革现状，抵抗侵略，学习西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们的理论和实践，虽然没有超出地主阶级内部改革的范围，但客观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有积极作用，因此，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先驱。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列强侵略的加深，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中国本身的落后，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向西方学习。然而由于他们立场、地位的不同，又区分为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两大阵营。其中洋务派只是主张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用以巩固封建统治，这就是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此他们热衷于船坚炮利，用洋枪洋炮编练海陆军，纷纷创建用西方机器生产的军工厂和民用企业。并致力于培养洋务人才。可是他们的学习西方，仅仅是“徒袭西学皮毛”，根本不能达到其所标榜的“求强”、“求富”目的。结果洋务越办，国家越穷；洋务越办，败仗打得越多。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战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覆灭，就一次又一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与洋务派学西方不同的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学习西方的做法，明显带有全方位学习的特色。他们是伴随着中国最早的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出现而涉足于历史舞台的，由封建地主阶级、洋务派集团中分化转变而来。在他们身上继承了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传统，代表了初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和要求。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三、四十年间，这些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纷纷写书，写文章，发挥变法理论，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思潮。

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汤震、何启、胡礼垣、陈虬、陈炽、郑观应等人，其中以郑观应和他的著作《盛世危言》的影响为最大。他们在自己的言论和著作中，都一再强调时代不同了，形势变了，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指出要通过向西方学习，寻求医治中国的方案，以实现解救民族危难和缓和社会矛盾的目的。具体地说，一是要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通过兼采西学，变法自强，来改变被侵略的地位；二是要积极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通过“商战”，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竞争；三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从政治上保障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为此，他们猛烈抨击“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派，也严厉地批判了只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技艺而反对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洋务派，大力宣传只有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最终避免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由此可见，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其中心内容，是提倡向西方进行全面的学习，范围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它代表着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当然，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存在着明显的弱点，一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理论思想缺乏了解，不能从理论的深度和整个体系的高度去认

识。变法理论尚呈现贫乏和不成熟性。二是局限于简单议论，而未曾从事具体的变法实践的准备活动，理论与行动严重脱节。三是缺乏实行变法改良的必要社会基础，不曾得到一定政治势力的鼓励和支持。但尽管如此，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兴起，对于日后戊戌变法的发生，无疑具有思想理论上的逻辑渊源意义；而其所提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命题，也成为戊戌变法所要努力实现的基本内容。

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都会造就自己的领袖人物，戊戌变法也没有例外。时势造英雄，它使自己的代表人物走向历史的前台；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运动的主角，就是在改良主义社会思潮不断发展壮大的背景下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而他的出现和展开活动，也标志着维新变法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他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文化传统教育，具有较深厚的文化素养。但是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他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使他对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政治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八股文一类学问感到一定程度的厌倦，越来越多地流露出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于是他先后到上海、香港等地游览和考察，在那里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并开始阅读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书刊，如《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等。通过学习和比较，康有为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顿觉“日新大进”，觉得西方在许多方面要比中国来得优越，中国要富强，要发展，就要向西方学习，走维新改良的道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从此，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前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考举人），当时正值中国在中法战争中失败不久，边疆形势日益恶化，国内各种矛盾十分尖锐。康有为目睹这一切，忧心忡忡，痛感时危，要求改变现状、发愤图强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了，并产生了付诸行动的冲动。于是不顾自己人微言轻，写了一封5000字的上皇帝书（第一书），用它去叩紫禁城的大门。康有为在书中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正愈演愈烈，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大，到处出现骚乱，类似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很有可能再度爆发。在这种形势下，只有赶紧变法，方可挽救时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康有为建议皇帝“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并对变法的成效充满信心，认为中国如能变法，那么10年之内，就能达致富强，20年之内，就可以报仇雪恨。这次上书，虽然没有提出具体变法措施，但确立了变法的初步原则。这是康有为把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变为向清政府正式提出政治建议的开始。

康有为的上书，引起顽固守旧官僚们的极大反感。在他们看来，一个毫无地位的书生，竟敢向皇帝大发议论，实在是“不成体统”。所以他们不仅拒绝将书转呈给皇帝，而且还以康有为“狂妄”为理由，将本已考取举人的康有为革除功名，不予录取，以示惩戒。这次上书，虽因顽固派徐桐等人的阻扰而未能送到皇帝本人的手中，但却在一些爱国人士中辗转传诵，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康有为本人也由此而声名鹊起，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康有为见自己的变法建议书没有送到皇帝那里，曾写下“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的诗句。意思是说，这次上书虽然失败了，但他这个

在野的知识分子并不因此灰心，还要加油干。然后，他回到广州，于 1891 年在广州长兴里设立了一个名叫“万木草堂”的学馆，招收学生讲学，宣传他的维新思想，并积极培养维新人才。万木草堂创办之后，各地有志之士纷纷前来求学，学生前后达 100 余人。这样康有为开始在自己周围聚集起相当数量的同志，形成了一批维新活动的骨干力量。这中间包括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徐勤等人。其中以梁启超最为著名，他当时已经是一位年少的举人，却来拜还没有考上举人的康有为为师。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梁启超放弃了专搞科举考试的那一套东西，扩大学术领域，学习经学、理学、史学和西学，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成为康有为的主要助手，被人们合称为“康梁”。

理论对于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康有为对这一点是有深刻的认识，并予以高度的重视的。所以在万木草堂期间，他除了收徒讲学之外，还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了建立变法理论的事业。这方面他主要的工作是著书立说，在书中着力引申和附会孔子的学说，作为自己变法的理论依据。其中有两部书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过巨大的震动，对日后的戊戌变法具有深远的影响。一部是 1891 年写成的《新学伪经考》，另一部是 1892 年开始动笔，几年之后才完稿的《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两本以学术著作面目出现的政治理论专著。康有为在这两本书中，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发挥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为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寻找理论上的依据。他一方面公开宣布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为“伪经”，引导知识分子去怀疑封建传统文化，从而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提出挑战，这样就在政治上起到了打击那些坚持“祖宗之法不更改变”的顽固守旧势力的作用，为维新变法扫除了一些思想障碍。另一方面，他着重宣传所谓的孔子“托古改制”的思想，认为孔子著写“六经”，乃是假托古代圣王的言论，来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改革当时的社会现状。康有为表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对孔子这一“托古改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没有违背儒家的道统。在此基础上，康有为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要求出发，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公羊学派的学说，认定历史必将由“据乱世”朝着“升平世”、“太平世”方向发展。这样康有为既为自己找到了从事变法的思想旗号——儒家祖师爷孔子，又直接冲击了顽固派的“敬天法祖”陈腐思想，论证了君主立宪代替君主专制的历史合理性，给变法维新找到了理论依据。

康有为这种以儒家正统面目出现来兜售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货色的做法，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人背景的。这是因为康有为毕竟长期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习惯于从儒家思想武库内寻找武器，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推行自己新颖的政治主张。同时，当时的中国仍是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社会，大多数人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所知甚少，有的还抱有抵触仇视心理，打出孔子的旗号，可以减少反对的阻力，有利于宣传维新思想，用康有为自己的话说，就是“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这也表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一登场就带有先天的政治上的软弱性，不可能真正与封建主义思想彻底决裂。

但是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中所提出的思想理论，给当时的思想界毕竟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用梁启超的评价，就是“思想界之一大飓风”。它们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成为号召资产阶级维新派投身变法实践的嘹亮号角，在戊戌变法发展史上占有不可低

估的地位。这从顽固派对这两本书恐惧、仇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必欲毁其书、杀其人而后快的普遍反应中，可以看到两书的影响之大以及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意义。

既有了理论上的指导，又有了一定的人才准备，康有为开始注意将变法主张逐步付诸具体的行动。这时，一个历史性的契机出现了，使酝酿了多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开始转变为具有实际斗争意义的政治改良运动，这就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马关条约》的签订。

1895年春天，是清政府定期举行选拔进士的国家考试——会试期间，各省举人齐集北京应试。康有为先一年考上了举人，取得了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这时正同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在北京参加会试。4月17日那天，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康有为探知条约的全部内容，痛心疾首，悲愤莫名，立即要梁启超去发动广东籍举人联名上书，请求清政府不要批准这个卖国的条约。湖南籍举人闻风而动，报名参加。4月22日两省举人便联合到都察院（清政府负责监督、弹劾、建议事宜的机构）上书。其他各省的举人群起呼应，也纷纷上书反对议和。一时间在都察院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议论沸腾，群情激愤，掀起了反对签约的巨大声浪。

康有为看到举人们的爱国热情高涨，大受鼓舞，认为“士气可用”，可为变法维新制造声势，决定联合在北京的广大举人，来一次规模更大的上书请愿。他一边和梁启超等四出联络，一边连夜起草了一封长达1.4万多字的上皇帝书（第二书）。书中指出《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认为这必将引起“外患内讧，危在旦夕”，极力主张拒绝和议，明定对策：第一，皇帝下罪己诏，处分主和投降的官员，以鼓舞人心。第二，迁都西安，以利再战。第三，选拔将领，编练精兵，购买武器，与日本决战。第四，发奋变法，推行富国、养民、教民的政策措施，改进工、农、商、教领域的面貌，同时，改变政治生活中上下阻隔、下情不能上达的状况，主张以府县为范围，每10万户中公举一位有学识，有才能的“士”（知识分子）充当“议郎”，供皇帝咨询和讨论重要政令，实现“君民共主”。康有为认为，在这4项建议中，前3项都是权宜措施，最后1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即所谓“变法成天下之治”。

康有为完成了这封上皇帝的万言书后，18省举人便齐集北京达智桥松筠庵开会，有1300多人在这封万言书上签了名。接着在5月2日，他们一起去都察院，把请愿书毕恭毕敬递送了上去。都察院的顽固官僚们对这些读书人的“闹事”颇感恼怒，便以《马关条约》已由皇帝盖印批准，无法挽回为借口，拒绝接受这次上书。

这次由康有为亲自发动的举人上书大请愿，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被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它虽然没有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它毕竟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举动，像一块大石头投入一潭死水的清朝政局，激起了一阵波浪。作为近代爱国知识分子首次群众性的政治请愿活动，它冲破了清政府“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上书的内容被辗转传抄印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推动了变法维新的改革浪潮。这样，“公车上书”就以其特殊的意义而被载入史册，即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正式转变为爱国救亡的维新变法运动、实现了由理论呐喊到实践操作的过渡。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三、结社活动与舆论宣传

“公车上书”声势浩大，影响广泛，这对康有为本人来说，也非常振奋，他决心趁着这种高涨的士气民风，加紧变法维新的准备。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的结果张榜公布了，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但他没有上任，而是为争取皇帝的赞同并在士大夫中制造声势而积极努力，以实现变法图强的目的。为此，康有为在这年5月29日又写成一封长达1.3万字的上皇帝书（第三书），内容与公车上书大致相同，只是删去了拒和、迁都的建议，增加补充了要求变法的主张，强调了变法改良的紧迫性并提出了变法的步骤。这封上皇帝书，仍是投送都察院。这次，都察院迫于当时的议论，把它递呈给了光绪皇帝。光绪是一位具有爱国心的皇帝，他对国家的衰落腐败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希望通过励精图治，来挽救时局，振兴国家，所以读了康有为的这封上书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认为康有为所提出的变法要求正是巩固统治，提高自己权势的重要途径。于是对它马上重视起来，命令誊抄4份，1份呈慈禧太后，1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总督、巡抚、将军审议，1份存乾清宫皇帝文件柜，1份存勤政殿，以备随时展阅。光绪皇帝在此事上表现出来的态度，表明维新派开始取得皇帝的重视和支持，这对变法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康有为于是再接再厉，紧接着在6月间又写了封上皇帝书（第四书）。在这封书中，他不再转弯抹角地借用汉代那个“议郎”的名称了，而是从正面郑重论证了设立议院的必要性，并认为当前应该尽快做好几件事：一、下诏鼓励臣民踊跃陈述政见；二、邀请有识之士讨论国家大事；三、设立顾问馆供皇帝咨询；四、设立报馆互通声气；五、设置专门机关吸引贤才到政府任职。这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实行君主立宪政治制造气氛和准备条件。为了消除光绪皇帝的顾虑及避免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康有为特地解释设立议院并不是要损害“君上之权”，强调议院的组成、变法的推行，都由皇帝来决断，企图以此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借推崇君权为名，行树立民权之实。这再一次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上的软弱。这次上书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到达光绪皇帝的手中，但是它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设立议院的主张，这在戊戌变法运动史上是有相当突出的意义的。

在积极给光绪皇帝上书，争取皇帝理解和支持变法维新的同时，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公车上书之后，又着手主要做了两方面的事情。一是积极争取地主阶级内部的开明人士，扩大变法运动的社会基础，组成维新改良的统一阵线，为推行变法寻找政治保障。二是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办学堂，大造变法的舆论，向众多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灌输维新变法的思想，以打开他们的眼界，争取更多的人参加到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来。

当时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派系分立，矛盾重重。其中主要的派别有三支，一是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二是以慈禧太后为头子的守旧顽固派，三是以光绪皇帝、户部尚书翁同龢等人为核心的地主阶级开明派。这三派的阶级立场虽然基本一致，但是在政治上却有先进和保守的区别，其对待摆脱民族危机、维持统治秩序、接受新生事物的态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开明派比较爱国，主张革新朝政；而顽固派和洋务派则主张守旧，反对变革和进步。同时，他们由于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关系的不同，又被时人区分为后党和帝党两大阵营。顽固派和洋务派多属后党，开明派基本上属于帝党。

在帝党和后党中，后党是掌握大权的实力派，而帝党则主要由翰林、御史等言官以及一些并无实权的部曹组成，手中并无实际权力，只能靠清议干预朝政。

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系的存在，决定了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加剧形势下其分化、对立的必然性，也使得维新派争取开明派支持变法、双方结成同盟有了可能性。帝党本来就有改革朝政、振兴统治的要求，只是苦于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时看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经济主张多有可取之处，便自然而然引以为同道，对其积极加以笼络和扶持；并希望借助于维新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实权，使自己成为政坛上的主宰力量。至于维新派方面，更需要借助于皇帝及其亲信大臣的势力，使自己的变法主张得到实施。这样双方就一拍即合，在维新变法的旗帜下走到一起来了，互相呼应，并肩战斗，从而扩大了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

这种维新派和帝党势力的联合，从公车上书之后即开始了。当时帝党领袖、光绪皇帝的师傅、时任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的翁同和，便以一品大臣的身份去看望小小的六品主事康有为。康有为受宠若惊，马上进行回访。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会晤中，康有为详细阐述了维新变法的道理，翁同和听了频频点头，表示赞同。此后，康有为又给翁同和写过许多封信，继续陈述变法的迫切性以及具体措施，进一步引起了对方的共鸣。这种政治联姻得到了很好的巩固和发展，双方互相策应，同舟共济，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样就大大扩大了维新运动的社会影响，有力推动了这一运动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

在和帝党结成联合阵线的时候，资产阶级维新派还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的工作。

1895年7月，康有为自己出钱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于12月起改名为《中外纪闻》出刊。由梁启超、麦孟华等人编写文稿，介绍西学和国际形势，大力鼓吹变法。它每期印刷1000份，免费夹在《邸报》（清朝政府的官报，专门刊登诏书、奏章一类东西）中分送北京的官员。1个月后，发行量增至3000份。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办的第一个报刊，在朝廷内外很有影响。

随之而来是组织学会，借助学会的名义进行政治改良活动。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奔走和推动下，1895年8月，由帝党官僚、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创立了“强学会”，推举户部主事，老牌改良主义者陈炽担任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强学会成立后，每10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还亲自撰写了《强学会序》，陈述了在列强侵略下的危迫形势，以及成立学会挽救时局的目的。在强学会中，康有为、梁启超居于发起者的主导地位，入会者以帝党官员为多数，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维新派与帝党的联盟。在当时，强学会在社会上声势很大，一些大官僚也乘机加入该会，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都各捐银5000两列名会籍，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也捐银500两入会，连李鸿章也想投机入会，但终因名声太臭而被拒绝。一些外国使节和传教士出于其影响中国政局的目的，亦将强学会看作是一个进入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渠道，纷纷加入。维新派没有能看清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反而想借助英、法等国的势力，抵御日、俄的侵袭，帮助自己进行变法，所以热忱欢迎他们入会。这充分体现了维新派在认识帝国主义本质方面的盲目性。

强学会在北京活动的影响一天比一天扩大，顽固派们再也不能容忍了，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准备伺机反扑，以致《中外纪闻》再也分送不出去。他们还声称要奏请慈禧太后严惩康有为。康有为呆不下去了，只好离京躲避风头，叫梁启超留守北京负责工作。

同年 11 月，康有为南下到达上海，在那里他取得张之洞的支持，建立了上海强学会。其成员除少数维新派人士外，以张之洞派系的成员占多数，从而结成了维新派与张之洞新洋务派的暂时联盟。上海强学会成立后，于 1896 年 1 月出版《强学报》，鼓吹变法维新，使维新运动在东南地区开展起来。当时的东南名士，如黄遵宪、张謇（jiān）等人纷纷成为该会骨干，使得上海强学会影响日益扩大。

维新运动的声势越是浩大，顽固势力的反扑就越是猖獗。他们公开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决心扑灭强学会这个组织。1896 年春天，御史杨崇伊受李鸿章的指使，上了一个奏章，攻击强学会结党营私，攻击《中外纪闻》鼓吹西学，背叛“圣教”，请求严禁。慈禧太后于是强迫光绪皇帝取缔强学会，查禁《中外纪闻》。以“通达时务”自诩的张之洞见风使舵，也随之查禁了上海的强学会和《强学报》。不久，强学会发起文廷式也遭到顽固派的诬陷，被革职逐回原籍。

强学会遭取缔后，维新派仍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使维新运动在全国各地不断发展。经过翁同龢的努力，又以京师强学会的旧址设立官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和报刊文章。在上海，由黄遵宪、汪康年提议，以上海强学会余款创办了《时务报》（旬刊），邀请梁启超担任该报总编辑。1896 年 8 月，《时务报》正式出版发行，主要刊载论说、上谕、奏折、京外近事、海外报译等内容。梁启超在这上面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鼓吹维新的论文，较系统地宣传了变法维新的理论，提倡“民权”。由于他的文章思想深邃，文笔流畅，故深受读书人的欢迎，使《时务报》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销数激增到 1 万份，成为维新派的主要喉舌，对推动维新变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北京、上海的变法维新活动蓬勃发展之时，湖南也迅速行动起来，并成为维新变法运动中最为活跃的省区，这是和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积极倡导和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的支持分不开的。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长大后曾游历全国各地，对社会有较广泛的了解。他十分不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更痛心于祖国遭到列强的侵略。甲午战争后，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走上了爱国救亡道路，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中最激进的人士。1896 年春他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等知名人士，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变法图强的事业之中，并写出了著名的哲学著作《仁学》，在书中他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激烈地控诉了封建伦常的滔天罪恶，号召“冲决”封建“网罗”，同一切封建束缚决裂，体现了强烈的民主精神。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与志同道合的唐才常等人携手合作，在湖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从 1897 年春天起，湖南的维新运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湘学新报》、《湘报》等报刊纷纷面世了，时务学堂设立了，南学会等会社成立了。谭嗣同、唐才常、陈宝箴、皮锡瑞、黄遵宪等维新派和地方开明官吏密切合作，利用报刊、社团、学校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使湖南的维新运动走在了全国各地的前列，并在南方各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湖南的维新运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理论宣传与新政实践并重。

在南学会等组织的推动下，湖南推出了一系列新政措施。一时间，内河小轮船、商办矿务、湘粤铁路、武备学堂等都先后兴办；课吏堂、新政局、保卫局等新政机构也相继建立，使得湖南的维新既有声势，又有实绩，并为日后的百日维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天津也是维新派活跃的地区之一。1897年10月，严复、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和《国闻汇编》，成为与上海《时务报》齐名的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报纸。严复在该报上发表了自己所翻译《天演论》，用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宣传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中国如不变法图强，就会遭到“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亡国厄运，只有“与天争胜”、“自强保种”才可以避免衰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向中国人民敲起了救亡图存的警钟，为变法运动制造了理论依据。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兼理论家与实践者于一身有所不同的是，严复是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而著称于世的，其主要贡献是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和介绍西学。

在四川，宋育仁等于1897年10月在重庆创办《渝报》。次年，又在成都创办了《蜀学报》。两报都大量介绍国内外形势，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提出改革的主张和方案，对推动四川的维新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898年5月，宋育仁等人在成都创立“蜀学会”、团结当地维新人士和开明士绅从事维新活动。

两广地区是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故乡，在全国维新派创建学会、举办报刊的热潮中自然也不甘落后。强学会被强迫解散后，康有为回到广州，仍在万木草堂讲学，并一度去香港、澳门活动。1897年2月，他在澳门创办了《知新报》，由他的弟弟康广仁和学生徐勤主编，成为中国南部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报刊。随即康有为又去桂林讲学，在那里成立了“圣学会”，出版《广仁报》，促使维新活动在两广地区高涨起来。

除了成立政治性学会之外，维新派还在上海、湖南等地创办了学术性学会和以改革社会风俗为宗旨的学会。前者主要有算学会、测量学会、法律学会、农学会、医学善会等等，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后者主要有女学会、延年会、不缠足会、禁鸦片烟会等等，提倡改革陈规陋习，弘扬社会正气。这些学会都从侧面很好地配合了维新政治运动的深入发展。

维新派倡导立学会、办报纸、兴学堂的活动方式是直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重要步骤，起到了启发民智、组织力量和制造舆论的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之间，维新派所创办的学会、学堂、书局、报馆多达300余所，主要分布于江苏、上海、湖南、广东、直隶等地区。这表明资产阶级维新派这时在中国已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领袖人物。维新派政治力量不断增强，其影响迅速扩大，这标志着维新变法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维新运动的持续高涨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强占山东半岛的胶州湾，接着是沙俄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广州湾，英国强占威海卫和九龙，使整个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瓜分的紧急关头。这激起了全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的巨大声浪，也推动着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出现了持续高涨的局面。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康有为急急忙忙从广东来到北京，进一步向光绪皇帝上书。这次，和1888年那次上书大不相同，和公车上书时也有区别。这时，许多地方已经建立了学会、学堂和报馆，维新派已有了一定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而光绪皇帝和帝党骨干鉴于国内外日益恶化的形势以及恢复皇帝权势的要求，也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变法的主张，并有了将它付诸实施的决心。

1897年12月，康有为在北京赶写了又一封上皇帝书（第五书），书中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慷慨激昂地强调变法维新的紧迫性。他沉痛地指出，日本议院天天在开会，各国的报纸议论纷纷，都在讨论瓜分中国的事情，中国正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机。而国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民众对统治者已完全失去信心，反抗情绪正越来越高涨，对统治秩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康有为在书中大声疾呼：现在已到了内外交困、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不变法，加以挽救，那么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就面临着被推翻的下场。为统治者的长治久安着想，康有为在书中替光绪皇帝出了3个对策：第一，以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为榜样，亲定国家大政方针，宣布全面变法。在变法措施制定和施行方面，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做法，这是上策。第二，召集有才能的官员，谋划变法，逐日分批召见这些官员，商讨变法的具体方案和步骤，权衡轻重缓急，依次推行，这是中策。第三，督促各省大臣，各就本省实行新政，限令其在3年内做出成绩，否则就撤职查办，这是下策。以上3策，他请光绪帝选择一个加以实行，说是能行上策，则可强国；能行中策，可保弱国地位；能行下策，仅可免于亡国。康有为当然希望光绪皇帝能行上策，把日本的明治维新移植为中国的“光绪维新”，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道路。

康有为这封上书，由于顽固守旧大臣的阻挠，而没有能送到光绪帝的手中，但因为它的内容痛切，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引起强烈的反响。天津、上海的报纸，还将它公开发表，使之广为流传。都察院的给事中（谏官）高燮（音谢 xiè）曾认为康有为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之士、可用之材，就上了一个推荐康有为的奏章，请光绪帝立刻召见康有为，委以重任。翁同和也趁势在光绪帝面前夸奖康有为。光绪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顽固守旧大臣从中拦阻，说是按朝廷的惯例，皇帝不能召见四品以下的官员，只能通过大臣“问话”代为转达意见。软弱的光绪帝于是改令大臣传康有为“问话”。

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召到总理衙门，由李鸿章、翁同和、荣禄和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等5大臣“问话”。这实际上是一次变法和反变法的小型辩论会，在“问话”过程中，康有为驳斥了荣禄、廖寿恒、李鸿章等人对变法的诘问和刁难，主张改变祖宗之法，强调变法应从改变法律、制度入手，并提出了变法的具体方案。康有为的想法，受到了翁同和的赞赏，他再一次向光绪帝保荐康有为承担重任。光绪帝又想召见康有为，但

仍受到顽固派的拦阻，只好将原定的亲自问答，改为书面建议，并要康有为将他编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呈送上去。这次“问话”，使得康有为大大接近了光绪帝一步，光绪帝下令，以后对康有为的奏章、条陈应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

到了1月29日，康有为写成奏折上给皇帝，这就是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第六书）。这一回康有为是“应诏”（遵皇帝之命），而不是自说自话上书了。在这封上书中，康有为反复强调必须变法的道理。他指出，世界各国都是通过“变法而强”，都是由于“守法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如果中国继续笃守旧法而不知变革，则前途不堪设想。只有毅然推行新政，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才能摆脱危亡，走向繁荣富强。

在上书中康有为还比较具体地提出了实行变法的3项措施。

第一，由皇帝出面，召集群臣宣誓变法，大臣们都要表示决心，革除旧习，努力维新，否则自请免官。

第二，设上书所于午门，允许天下士民自由上书，官员上书建议可以直接送到皇帝手中，无须代递，同时破格选拔人材。

第三，设制度局于宫廷，选拔通才数十人主持。皇帝每日到局议政，哪些应增，哪些应改，哪些保留，哪些废除，都要订立章程，颁布施行。这实际上是设立策划和实施新政的领导机构。在制度局下要分设法律、度支（财政）、教育、农业、工业、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局，地方则设民政局和民政分局，督办新政事宜。同时他还建议选派留学生，翻译外国书籍，改变科举制度，设立各种学堂，兴办银行，训练军队等等。

这个“统筹全局”的奏折，是康有为历次上书中比较重要的一次，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革新政治的全部要求，实际上成为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光绪皇帝看了这道奏折后，予以高度重视，就把它发给总理衙门的亲王、大臣会议。看来这个有血性的皇帝已经决心同顽固势力进行拚搏，推行维新了。

不久，康有为将自己的著作《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等呈送给光绪皇帝，同时又施展出他的上书本领，写了上皇帝的第七书。在书中康有为着重称述俄国彼得大帝当年放下尊贵的皇帝身份，到瑞典等国游历学习，取得经验后回国进行改革，终于振兴国家的事迹，建议光绪帝向彼得大帝学习，出国游历，吸取改革经验。康有为的这封上书使得光绪帝进行变法的决心变得更为坚决了，他把康有为“统筹全局”的奏折和《日本明治变政考》等书置放在自己的写字台上，经常披阅，并开始零星地下达新政诏书，将维新变法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

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等人变法主张的赏识和支持，使维新派人士受到巨大鼓舞。于是他们便联络各省旅京人士组成地区性的学会。1898年康有为等率先在京成立了粤学会，接着，林旭等成立了闽学会，杨深秀等成立了关学会，杨锐等成立了蜀学会。不久又先后出现了保滇会、保川会、保浙会等组织。它们通过各省在京人士的活动来扩大影响，把维新变法运动由北京推广到各省。这些地区性爱国组织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人们强烈要求变法救亡的愿望，标志着维新运动开始进入高潮。

1898年春天，北京又要举行会试了，康有为把握时机，准备动员和组织更多的会试举人参加维新运动，给顽固派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以推动变法。

于是他积极奔走，多方联络，和御史李盛铎共同出面，将各省来京会试的举人组织起来，于4月12日在广东会馆召开大会，并成立了“保国会”政治团体。会上通过了《保国会章程》30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基本宗旨，以救亡图存相号召，并决定在北京、上海各设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强调讲求变法、讲求内政外交和讲求经济实效，以协助政府进行治理。还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权限、领导关系、入会手续，会员权利，等等。由此可见，从强学会发展而来的保国会，是维新派发起和组织的全国性爱国政治团体，已经初步具有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保国会的成立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不少爱国知识分子和中下层官吏纷纷参加，许多富商大贾列名会籍。200多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尔后保国会又先后于4月15日和4月19日在崧云草堂、贵州会馆召开了两次大会。出席者人数都在200人以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到会发表演说，宣传救亡图存的主张，听者无不为之动容。经过保国会的推动，维新变法的声浪在士大夫中更大程度地激荡起来，相当一部分人中间造成了非变法不可的舆论。

但是，在当时中国的政坛上，顽固派势力占有绝对的优势。尽管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革要求是有限的，其斗争的态度也是怯懦和妥协的，可顽固派仍是无法容忍，处处加以反对、破坏。这从1888年以来就是如此，顽固派为了消除维新思想的传播，限制维新力量的成长，曾不择手段地禁止传播西学、焚毁新书、查禁报纸、封闭强学会、哄散南学会，驱逐维新人士。并打击和排斥同情、支持维新派的帝党人士，孤立光绪皇帝。现在维新派从强学会、南学会发展到保国会，由地区性的立会，进而发展为全国性的具有政党规模的统一组织，影响越来越大，顽固派自然是看在眼里，恨在心头，要千方百计进行恶毒攻击，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顽固派小罗喽、御史文悌第一个跳将出来，上书弹劾保国会，说它同所谓的“会党土匪”没有任何区别，诬蔑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指责它仅仅是空喊保4万万，而将大清帝国的命运置之度外。文悌的论调，引起所有顽固派的共鸣。顽固派头子之一、协办大学士荣禄公开对人说：康有为成立保国会，纯属犯上作乱行为，他这样狂妄，非杀不可！你们当中如有熟人入保国会的，叫他们当心自己的脑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个御史名叫潘庆澜的，居然在上奏中给康有为等人扣上了聚众滋事，阴谋叛乱的罪名。顽固不化的军机大臣刚毅，准备据此进行查究。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局势对康有为等维新派相当不利。一些不坚定分子，在权势显赫的顽固派威胁之下，畏葸退缩，退出了保国会。连身为保国会发起人之一的李盛铎，这时也见风使舵，反过来上疏攻击保国会，以求免祸。

所幸的是，光绪皇帝不仅没有听取顽固派的陈辞滥调，反而替保国会辩护和撑腰，声称“会能保国，岂不大善”，表示不能加以查究。光绪还果断地免去了文悌的官职，给顽固派以一个反击。但尽管如此，保国会还是无法再坚持下去，不久便自行停止活动。其他如保川、保浙、保滇诸会的命运，也和保国会一样，很快走向瓦解了。

保国会的兴起，说明维新运动正处于持续高涨的阶段；而它的很快衰亡，则表明顽固势力的强大，维新变法的道路决不会平坦，守旧与维新之间的对立是无法加以调和的。这种对立的中心问题是三个，一是要不要变“祖宗之法”；二是要不要废八股、提倡西学；三是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政

治。维新派是问题的提出者，他们的答案是“要”。顽固派是问题的反驳者，他们的答案是“不要”。双方围绕这些重大问题展开激烈的言词论战和政治交锋，成为整个戊戌变法运动演变、发展的主线。

虽然保国会因被顽固派破坏而夭折了，但是它的宗旨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会上发表的演说，却由于在天津、上海、广州各地报纸刊载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变法事业仍在按着既定的轨道一步步走向成熟。

五、百日维新

1898年夏天，北京城里的政治气氛越来越趋于紧张。后党一方的顽固守旧大臣，害怕维新变法将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和封建秩序，以慈禧太后为靠山，想拼命将变法运动压下去。而光绪皇帝则有感于民族危机的深重，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决心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形势，推行新政，挽救危局，同时摆脱自己的傀儡皇帝地位。这时，拥护变法的御史杨深秀、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先后向光绪帝上书，请求“明定国是”，即要求决定变法大计。光绪帝看了奏章，觉得这话说到自己心坎里去了，决定当机立断，实行变法。他通过庆亲王奕劻向慈禧太后表示：太后如果再不给我处理问题的权力，那就不当这个皇帝。慈禧闻言勃然大怒，愤愤说：他不愿做皇帝，其实我早就不想让他做了。在奕劻的劝说下，慈禧太后答应暂时向光绪放权，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于是奕劻转告光绪帝：皇上要办事可以去办，太后不会加以阻拦。

既然慈禧暂时松了口，光绪帝的腰杆就变得硬朗起来。便于6月11日召集军机堂会议，根据康有为所提出的第一条变法措施，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在诏书中，光绪帝严厉指斥了那些主张遵守旧章、反对变法的顽固派，表示了变法的坚定决心。新政就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为止，一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为了引用新进人物，辅佐新政，光绪帝下令康有为于6月16日入紫禁城朝见，命令黄遵宪、谭嗣同由湖广总督护送前来北京，又派总理衙门考察梁启超，准备任用。新政正在冲破皇帝不能接见小臣的“祖宗家法”。

康有为梦寐以求想见皇上的愿望实现了。6月16日那天，光绪皇帝如期接见了，同他交谈了两个多小时，这是皇帝接见臣下罕见的例外。两人详细商讨了变法的步骤和措施。光绪皇帝表示完全同意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意见，以为必须大胆变法。康有为听了深受鼓舞，进而指出日本搞“维新”30年就强盛了，中国好好变法，3年内就可以自立。接着康有为又询问光绪帝说：皇上既然明白变法的道理，为什么迟迟没有举动，坐视国家危亡？光绪帝表示自己受种种掣肘，不能放开手干。康有为一听就明白是慈禧在从中作梗，为了减少来自顽固派营垒的压力，便建议光绪帝说：皇上可以就权力能够做得到的先做起来，虽然不能尽变，如能扼要地做几桩大事，也可以救中国。在具体做法上，不必尽撤旧衙门，只须增设新衙门，不必尽撤旧大臣的官职，只要擢用有才干的官员；多多召见和任用维新人士，不必给予高官厚禄，只需要给他们委派任务，给个头衔，准许他们有直接给皇帝上奏折的权限就行了。光绪帝很赞同这些见解。康有为的策略和光绪帝的态度，虽然有利于为变法推行扫除一部分阻力，但也充分反映出维新派和他们的皇上对守旧势力的软弱妥协。

经过这次君臣间的对话之后，光绪皇帝准备重用康有为，以便让他更积极地为新政出力效劳，但因荣禄、刚毅等人的反对，又害怕触怒慈禧太后，结果只给了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办文稿）这个较低的位置，但准许其专折奏事。在起用康有为的同时，光绪皇帝还积极引进其他著名的维新派人士，于7月3日召见了梁启超，赏给他六品官衔，委任他负责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的事务。梁启超只是个举人，没有做过官，那时称没有官阶的知识分子为“布衣”，他以“布衣”身份被召见，满心感激，说这是清朝“数百年

所未见”的特殊待遇，遂全身心投入新政大业。光绪皇帝又于八、九月间先后召见了严复、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人，并在9月5日授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参与新政方面的机要工作，负责批阅奏章，为皇帝的诏书拟稿，时称“军机四卿”。通过这些动作，光绪皇帝使自己身边初步形成了一个推行新政的智囊、助手集团。

康有为等人利用专折奏事的特殊待遇，不断地上奏折、递条陈，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政建议。在政治方面，要求定宪法，开国会，建立制度民政局。当顽固派阻挠开制度局时，又主张开懋勤殿以议新政。总之，要以日本为师，大胆进行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在经济方面，要求振兴农、工、商业，奖励工艺创新，开矿筑路，举办邮政，废除漕运，裁减厘金，保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文教方面，要求废弃八股，查禁淫祠，撤除书院，兴办学校，创办报馆，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并派遣留学生，培育建国人才。在军事方面，要求裁减旧军，编练新式陆海军，整顿国防，实行征兵制；并建议废省改道，将全国划分为100道，每道练1军，每军7000人，其中40军防守东北、蒙古和新疆边境，以巩固边防。这些建议内容翔实，涉及方方面面，充分体现了维新派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思想，反映了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热切要求。

百日维新的主要特征，是光绪皇帝采纳维新派的种种建议和主张，用颁发诏书的形式推行改革。即康有为等人今天一个奏章、明天一项条陈的新政建议，流水般地传到紫禁城里，经过光绪皇帝，把奏章、条陈变为诏书、谕令，又一件一件从紫禁城里飞出来，落到中央各部大臣及地方督抚大员的办公桌上。换句话说，就是康有为为变法维新的设计师，而光绪帝则为变法维新的决策者。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从紫禁城中飞出来的新政诏书、谕令，一共是110多项，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方面：在京城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农工商分局，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总理衙门制订有关制造的奖赏章程，奖励发明创造，在上海、汉口等大城市，筹设商学、商报、商会各项组织，逐步推广，设立茶丝公司，采用西法制作，扩大行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在京城设立铁路、矿务总局，统一管理各省的开矿和筑路事宜。在京城及各通商口岸设立邮政局，广办邮政，裁撤驿站，提倡西法开垦土地和私人兴办实业。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和决算。等等。

（二）政治方面：准许创办报刊，提倡上书言事，给予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改订规章条例，各部院章则条文中凡语意混淆、烦琐难行的，通通删除，另订简明条例，切实施行；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撤消管皇室家事的詹事府和管理内外章奏的通政司等衙门，裁撤总督、巡抚同在一城的湖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其事权由当地总督兼管。提倡廉洁，澄清吏治。取消旗人原由国家供养的特权，让他们参加士农工商等职业，自谋生计。

（三）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凡国家的会试、省级的乡试及府县的生童岁科（考秀才），一律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并开设考试经世致用学问的“经济特科”，选拔新政人才。设立学堂，学习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旧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学中学和西学的学堂，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民间祠庙，也要改为学堂，并筹设铁路、矿务、农务、茶务和医科等专门学堂。

设立译书局，组织翻译外国的新书。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并鼓励有志上进的王公贵族和大臣到先进国家游历，开拓视野，增长见识。

（四）军事方面：精练陆海军，添造兵船，增强海军实力，培养海军人才。陆军改练洋操，使用洋枪，按照西方国家兵制，改订新章，并统一制度。各省机器局生产的枪炮弹药，必须统一规格，以符合实战需要；裁撤淘汰绿营及练勇，挑选精壮，勤加训练。同时力行保甲，充实军事后备力量。

当然光绪皇帝所颁布的新政和维新派变法的建议，在内容上并不完全一致。维新派为了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曾建议废漕运、裁厘金，但它们因有损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光绪皇帝没有予以采纳。而维新派多年来奔走呼号、梦寐以求的“君主立宪”政治，由于影响到皇帝本人的权力，光绪帝在有关的新政诏旨中也根本没有一字提及，康有为等人所提的“立行宪法，大开国会”的建议，到了光绪皇帝那里，均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至于维新派一再强调的设制度局的设想，同样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没有下文。这说明光绪帝对于新政建议，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是以有利于他的皇权统治为取舍标准的。他虽然支持维新派，但是在政治态度上和资产阶级维新派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尽管光绪帝没有向资产阶级维新派完全开放政权，但是他的变法上谕，仍基本上反映了维新派的愿望和要求，即在政治上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在经济上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在文化教育上也采取了一些打击旧学、提倡新学的措施。这些改革措施，是第一个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把中国引向近代化的蓝图，它或多或少打击了封建统治秩序，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先进科学、文化的传播，并给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参与政治的可能性，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使古老沉睡的神州大地，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线希望之光。

可是，光绪皇帝的新政，大都还只是纸上的东西，而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康有为等人把皇帝下诏书看得极为重要，以为只要依靠最大的统治权威——皇帝的命令，就可以把纸上的东西变为现实的东西，这无疑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新政既然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必然要遭到封建顽固势力与洋务派官僚的抵制和反对。他们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根本没有把光绪这个傀儡皇帝放在眼里，所以光绪帝颁布的诏令，始终没有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中央二品以上的大臣，讲新政的只有李端棻寥寥几人，绝大多数都对新政抱敌视、否定的态度；在各省的总督、巡抚中，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能比较认真、得力地推行新政外，其他都是些抗拒新政或阳奉阴违的人。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于光绪帝下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当光绪帝电旨催问时，刘坤一诡称“部文未到”，而谭钟麟竟“置若罔闻”。光绪帝虽然下诏奖励过陈宝箴，也下诏斥责过刘、谭等人，但这对于那些狡猾的封建官僚来说，并无多大作用，新政在地方上依然得不到推行。在中央，有些新政机构虽然建立了起来，但大都为顽固派所把持，基本上有名无实，形同虚设。因此，光绪帝的变法诏令大都成了一纸空文。

六、血溅菜市口与变法失败

维新改革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其锋芒所向，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腐朽势力，因此，遭到了各种反动势力的抵制和攻击，他们纠集在慈禧太后的旗帜下，蓄积力量，窥测时机，准备发动政变，将维新运动扼杀于血泊之中。这一阴谋，从光绪实行新政的第一天起便开始酝酿了，并随着新政的推行而密锣紧鼓加紧策划。反扑越来越猖獗，气氛越来越恶劣，维新派和顽固守旧派之间，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冲突与斗争日益激化，双方进入了最后决战阶段。

就在变法诏书下达的第4天，即1898年6月15日，在顽固派总头子慈禧太后的威逼下，光绪帝被迫以自己的名义，在1天之内连下了3道预告新政危机的谕旨。一是撤消翁同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逐回江苏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同和是光绪唯一的亲信大臣、帝党首领，他的被罢斥，使光绪帝更加孤立，给帝党和维新派以沉重的打击。二是规定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文武大臣，都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本来慈禧太后已经归政，照例不再召见臣子。这一违反“祖宗家法”的规定，目的在于把用人大权抓到她自己的手中，防止光绪帝破格重用维新人士，并为她自己再度临朝听政作准备。三是任命顽固派首领、慈禧太后头号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改为实授，加文渊阁大学士，统率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袁世凯新建陆军等北洋三军，以控制京津和华北地区的兵权。同时，慈禧太后还委派她的忠实奴才、顽固派大臣崇礼、怀塔布、刚毅等人分别担任步军统领、健锐营提督等要职，进一步将京城和颐和园的警卫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在此基础上，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还加强了对内廷和光绪帝本人的监视，凡出入宫门的人员，虽是王公大臣，都须经检查后才能放行，光绪帝的一举一动，均为顽固派所侦知。这三道命令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措施，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新政，而且也为顽固派发动反动政变做好了准备。

顽固派的反扑，不但表现为其对中央军政大权的掌握和政变阴谋的酝酿，同时也表现为得到地方上各种腐朽势力的支持和呼应。反对新政的社会基础是如此雄厚，使得新政处处遭到敌视和诽谤。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新政的推行，不能不触犯一些人的利益，他们当然要群起反对。譬如考试中废除八股文，使大批八股士人倚为身家性命的敲门砖一旦变为无用之物，这简直是比挖了身上的肉还要疼，岂能甘心，于是就大肆攻击新政，湖南有个名叫曾廉的举人，甚至上书请求处死康有为和梁启超。废淫祠、停书院的命令发出后，许多上豪劣绅和和尚道士失去诈骗勒索的工具，就到处散布破坏新政的言论。一些衙门裁撤后，大批丢了乌纱帽的官员，更是惶惶如丧家之犬，极端仇视新政，或造谣惑众，或上书恫吓，使得京师谣言四起，一忽儿说光绪帝入了天主教，一忽儿说康有为在宫中设立礼拜堂，甚至说将尽废六部九卿。旗人自谋生计的诏书发下后，更是掀起轩然大波。满州贵族借机煽动，管理皇家事务的内务府大臣立山率领内务府官员数十人前往颐和园，连同太监李莲英，跪在慈禧太后脚下哭诉告状，攻击光绪，说皇帝不要满人了，并恳请皇太后临朝“训政”。这些从中央到地方的腐朽力量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慈禧发动政变的重要社会基础。

面对十分险恶的形势，年轻的光绪皇帝表现了相当的勇气和魄力，曾在一定程度上对顽固派的进攻进行了反击。9月4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

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津、溥颋、曾广汉等6人全部革职，并奖励敢于上书言事的王照，赞扬他“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他三顶品戴头衔，以四品京官身份候补。紧接着，在9月7日，光绪帝又将阻挠新政的李鸿章、敬信等人从总理衙门驱逐了出去。这种打击顽固派官僚的措施，在朝廷内外引起很大震动，鼓舞了维新派人士和帝党官僚。

光绪皇帝的态度和做法，更激起了慈禧太后的愤怒，便把政变提到紧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顽固派军政大员认为时机已到，就纷纷出动，兴风作浪，怀塔布和李鸿章的亲家杨崇伊等人，禀承慈禧的旨意，相继赶往天津，与荣禄阴谋策划。荣禄对慈禧的指示百折不扣地执行，调兵遣将，精心部署。为此，他调动聂士成的军队移驻天津陈家沟，调动董福祥的军队移驻北京外围长辛店，发动政变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以至京津一带盛传10月间慈禧偕同光绪去天津阅兵时，荣禄将举行兵变，废除光绪皇帝。新旧两派的斗争已进入最后阶段。

面对变法运动的危机，光绪皇帝一筹莫展。康有为也忧心如焚，忙不迭向光绪帝提出三项对策：第一，仿照日本成立参谋部，收回军权，皇帝自为陆海军大元帅；第二，改元为维新元年，断发易服，以表示变法的决心；第三，迁都上海，以摆脱后党的包围。乍看起来这三策头头是道，其实却是空言无补，因为它们根本行不通。可见，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本身既脱离民众，又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仅仅依靠一个空头皇帝，根本拿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对策，绝无力量对付由顽固派的政客、军阀等实权人物所组成的阴谋集团。

大祸就要临头，光绪皇帝和维新人士不甘束手就擒，还要作最后挣扎。反复商量的结果，他们决定通过两个途径摆脱危机，挽救败局。这一是设法争取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以抗衡顽固派的压力；二是做新建陆军统帅袁世凯的工作，把他拉过来对付荣禄的武装力量。外交努力与内部争取双管齐下，来保卫新政，赢得主动。

早在新政之前，英、日等帝国主义分子为了和沙俄争夺在中国的霸权，曾装出一副慈善心肠，假惺惺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竟天真地相信了他们的谎言，称赞英国是“救人之国”，并专折奏请联合英、日，企图借此对顽固派施加压力。可是这些帝国主义分子此时看到维新派败局已定，遂无意再支持光绪帝和维新派，只对光绪皇帝虚表“同情”而已，康有为等人争取外来支持的活动，以毫无结果收场。

在进行外交努力的同时，康有为又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身上。袁世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参加过淮军，后来几经钻营，于1895年以道员衔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掌握了一支7000余人的新式武装。他曾加入强学会进行投机，捞取了维新的名声。由于这个缘故，康有为把他列为积极争取的对象，希望利用他用武力同顽固派斗争。为此，当新政处于失败的边缘时，康有为派自己的弟子徐仁禄去小站，同袁拉关系，并写了一道密奏，由谭嗣同上递，向光绪帝推荐袁世凯。光绪帝急病乱投医，在9月16日召见了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第二天，再次召见，面谕袁世凯可以不听荣禄指挥，委以全权。可袁世凯十分狡猾，并不打算为光绪皇帝卖命，而是脚踏两头船，观察政治风候，以便牟取最大的私利。所以在接受光绪的召见后，便立即去拜谒顽固派军机大臣刚毅、裕禄、王文韶等人，以求取得后党的谅解。光绪帝和维新派错误地把命运交给袁世凯这种人，决定了他们的失败完全不可避免。

顽固派的政变迫在眉睫，光绪皇帝内心紧张万分，在 9 月 14 日那天交给杨锐一份密诏，要他迅速交给康有为等人。密诏中说：现在我的皇帝位置快保不住了，你们这些维新派赶紧想想办法，来给我保驾。杨锐读了密诏，眼见大祸临头，吓得六神无主，竟将密诏搁置在他那里没有送出，一放就是三、四天。光绪帝等了几天不见康有为复命，心急如焚，在 17 日再次给康有为一道密诏，交由林旭带出。密诏借题要康有为去上海督办官报，催促他赶紧逃离北京，“迅速出外，不可迟延”，留着性命，将来好为皇上效劳。9 月 18 日，林旭把光绪前后两道密诏一齐交给了康有为。康有为立即召集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等人在南海会馆商量对策。他们读了密诏大惊失色，抱头痛哭，可是谁也想不出办法来挽救局面。绝望之中，他们决定把一切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同时向英、日等国在北京的公使馆求救。

9 月 18 日深夜，谭嗣同怀着极为危险的侥幸心理，只身前往袁世凯在法华寺的寓所。双方见面寒暄后，谭嗣同说了几句试探口风的话，问袁知不知道天津阅兵的密谋。接着便把来访的目的，毫无保留地端了出来，劝说袁世凯带重兵先发制人，诛杀荣禄，清除旧党，围颐和园（慈禧太后住所），为皇上救驾，以建立万世之功。为了激将袁世凯，谭嗣同又用手抚摸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你不打算救皇上，向颐和园告密，杀了我的头，也可以得大官。”谁知老奸巨猾的袁世凯竟然激昂地表示：“你把我袁某看作什么人！皇上是我们共事的圣主，救驾的责任既是你的，也是我所义不容辞的。”还说：“天津阅兵时，如果皇上迅速地跑到我袁某的军营里，那么杀一个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随后，他又装出一副很慎重的样子说，事情这样紧迫，我得先回天津去，调换几个军官，贮备一些弹药。谭嗣同听了满心以为策划成功，再向这个刚刚结为“战友”的袁世凯叮嘱一番，在沉沉夜色里辞别了法华寺。

袁世凯在送走谭嗣同后，掂量思考再三，觉得跟随光绪皇帝前途黯淡，反之若投靠后党，则可以捞取富贵功名，飞黄腾达，于是就决定出卖维新派，向后党告密。9 月 20 日他赶回天津，直奔总督衙门晋见荣禄，将谭嗣同的策划和盘托出。荣禄听后，非常重视，当晚挂专车到北京，飞奔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告发。

慈禧太后闻报怒气冲天，于 21 日凌晨从颐和园急急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的寝宫，吆喝光绪帝说：“我抚养你 20 多年，竟听小人的话，要谋害我！”光绪帝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慈禧恨恨地骂道：“蠢东西，今天没有我，明天还会有你吗？”便搜走所有文件，把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y0ng）台。接着慈禧又立即用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即日起由皇太后“临朝训政”。并着手部署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的事宜。

当政变发生时，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还聚集在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寓所，一起商讨挽救的办法。决定由李提摩太去见英国公使，容闳会见美国公使，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可是屋破更遭连夜雨，船漏偏遇顶头风，英国公使还在北戴河未回，美国公使也在西山度假，都没有联系上。梁启超虽然见到了日本公使，可也得不到实际帮助。其实即便美、英、日公使出面说话，同样也无助于挽回败局。因为对于慈禧等顽固派来说，什么都可以丧权辱国，唯独自己的宝座不容外人撼动。

政变后的北京一片白色恐怖，顽固派想乘机将维新力量一网打尽。当天，崇礼领兵包围南海会馆，抓走了康广仁。康有为已于前一日化装逃离北京，在英国人的掩护下，经天津、上海，潜往香港避难，躲过清廷的追捕。梁启

超则在日本公使馆的帮助下，化装出京，由天津乘日舰逃往日本。谭嗣同却拒绝了友人要他出走日本的劝告，激昂地表示：各国变法都是要流血的，如今中国变法还没有听说流血的，这是中国之所以不昌盛的原因。那么就由我第一个流血牺牲来改变这种情况吧！决心以一死来报效维新事业，用鲜血来唤醒人们的良知。

9月22日，荣禄派兵3000名，封锁北京各城门，断绝交通，搜捕维新人士和帝党，谭嗣同等多人被捕下狱。在狱中，谭嗣同视死如归，豪气凌云，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慷慨悲壮诗句。9月28日，清政府未加审讯，悍然将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等6人残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在法场上，谭嗣同临刑不惧，面对顽固派的屠刀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延颈从容就义。其他维新派和众多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开明官员，如张荫桓、陈宝箴、江标等人，有的被罢官，有的被放逐。政变后，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其余全部都被废除，一切旧制也随之复辟。顽固守旧势力弹冠相庆，戊戌变法运动宣告彻底失败。

七、伟大的历史意义

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悲壮地失败了。维新派人士或倒在血泊之中，或流亡海外，为他们的理念和行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光绪皇帝，这个积极施行新政以发愤图强，委用维新志士以革除冗官弊政，行西法以求振作大清帝国的年轻皇帝，也被赶下了台，在极端痛苦中默默度过了他的后半生。这一切说明，在古老的中国，改革的步履是如此的艰难沉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要搬动一下桌子，也得流血牺牲。

戊戌变法被扼杀于血泊之中，这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资产阶级维新派势力过于弱小，而其对立面封建顽固势力十分强大，双方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在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形成，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非常薄弱，远远不是封建势力的对手。这一基本条件，决定了维新派在政治上软弱幼稚，他们手头没有一兵一卒，又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既远远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不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又没有能分化洋务派和顽固派，造成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动荡。只是寄希望于没有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和极少数帝党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企图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有限改革。这种既无政治实力后盾，又无正确战略策略方针，更无群众基础的主客观因素存在，决定了软弱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经不起封建反动势力的猖狂反扑，势必在斗争中碰得头破血流，遭到彻底的失败。这也显示了一个血的教训：在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巨大历史意义却是显而易见、永远不可磨灭的。

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救亡政治运动。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甲午战争后的民族危机，在国难当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奔走呼号，单枪匹马地掀起了变法图存、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救国运动，这充分显示了这一新兴阶级的政治朝气和精神风貌。在斗争中，他们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祖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维新派的爱国精神和实践，点燃了中华大地上的爱国、民主的火炬，唤发了民族意识，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召唤着一代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而献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爱国运动的重要里程碑。

戊戌变法运动也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落后、反动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这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具体地说，就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政治上变封建君主专制制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为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开辟道路；在经济上革除阻碍工商业发展的封建束缚，提倡兴办近代工矿、交通运输和金融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百日维新期间所颁布的各项变法诏令，大都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它使资产阶级获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也多少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这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戊戌变法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它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历史的史册，为后人所缅

怀和歌颂。

